

赠送

- 董必武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
- 关于「一分为二」与「合二为一」的论战
- 一九六八年：中国「五七」干校之滥觞
- 监事会工作生活纪实
- 恩施地区试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小记
- 忆国民党军委会《扫荡报》的变迁
- 回忆第五战区的特务组织

二〇〇八年第一辑（总第八十四辑）

湖北文史

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湖 北 文 史

二〇〇八年第一辑

(总第八十四辑)

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北文史. 2008 年第一辑(总第八十四辑)/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8.6

ISBN 978-7-216-05671-7

I. 湖…

II. 湖…

III. 文史资料—湖北省

IV. K29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0510 号

湖北文史

二〇〇八年第一辑

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(总第八十四辑)

出版: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文印中心

印张:7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插页:1

版次: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75 千字

印数:1-5 000

书号:ISBN 978-7-216-05671-7

定价:20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目 录

时 代 追 踪

- 董必武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 杨显东(1)
- 关于“一分为二”与“合二而一”的论战 萧岛泉(26)
- 一九六八年:中国“五七”干校之滥觞 李城外(63)
- 监事会工作生活纪实 刘济民(71)
- 湖北省民盟为“中部崛起战略”献计出力的
前前后后 黄向东(90)

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

- 恩施地区试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小记 王利滨(98)
- 我在蕲春县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
精神的回忆 周北辰(109)

沧 桑 看 云

- 忆国民党军委会《扫荡报》的变迁 万枚子(133)
- 武汉解放初是怎样稳定物价的 程 华(141)
- 关于“亲水走廊”的回忆 张献宏(145)

一个乡级高考点诞生记	蔡万顺(152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江 汉 寻 梦

抗战前筹设鄂湘川黔边特区概略	王 平(157)
回忆第五战区的特务组织	鹿盛文(162)
随谢冰莹在五战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	甘和媛(175)
到敌人后方去求学	王野亭(185)
南下武汉接管国民党印刷业的回忆	邢西彬(195)

名 家 谈 往

张文秋家世	张文秋(202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闻 人 聚 焦

张体学省长勤政倡廉二三事	朱品仙(216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杨显东^①

董必武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

1937年11月，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，上海、太原相继失守，南京紧急疏散，武汉也岌岌可危了。一天，我和孙耀华^②激动地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，求见董必武。

门卫接过我的名片一看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杨某某。他一声不吭地上楼去了。随即下来一位中年同志对我说董老正忙着，可以先和他谈谈。我说：“有重要事情，要当面和董先生谈。”这样，董老便亲自下楼接见我们。一见面，孙耀华就连忙替我介绍：“他是农业专家，美国博士，刚从苏联考察回来。”

① 杨显东（1902—1998），湖北沔阳人，1923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科，主攻棉花和蚕桑专业。1927年夏毕业后，在河南训政学院任教。1928年，任湖北省棉业试验场技士兼代场长。1934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，1937年获博士学位。1937年，在湖北应城汤池举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。1938年在襄阳举办鄂北棉业讲习所，1939年在谷城举办茨河手纺织训练所。以后又任经济部农本局特派员兼福生总庄樊城分庄主任、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湖北推广专员、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，以及重庆美国经济作战局农业顾问等职。1945年10月，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副署长、代署长。1948年，任上海粮食紧急购储会特别顾问。1949年，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。同年9月，赴北京任农业部副部长。

② 孙耀华，时为湖北省应城县县长。

我是湖北人，从小就听过一些有关董老的传说，总以为他是个威风凛凛、文武双全的人物。见面才知他竟是那么文质彬彬，和蔼可亲。

开始，董老很少言语，只是含笑地听我们说明来意。接着就询问我的情况，问得相当具体，最后才对我们提出的要求，表示赞赏和同意。

我出身在湖北沔阳一户贫寒的农家，“沙湖沔阳洲，十年九不收”。祖上几代都逃过荒，要过饭，受尽地主恶霸的欺凌。我6岁丧父，很小就放牛、下田干农活。以后农闲在私塾念书，直到13岁才勉强上小学。后来上了大学，学农科。毕业后，在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里，当过农业教官；接着回湖北，在湖北棉业试验场工作。其间，即1931年，曾陪同国际联盟代表团到洪湖革命根据地、也就是我的老家作过调查，使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，开始有了感性认识。1934年，在社会贤达石瑛、李范一的支持下，公费留学美国，专攻棉业。当时，在美共同学的帮助下，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。1937年毕业回国时，由美共介绍到苏联去访问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，那时正是斯达哈诺夫运动的高潮期间，使我再一次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。

当我抱着农业救国、科学救国的理想，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，越过关东军控制下的“满洲国”，好不容易抵达北平时，恰逢“七七”事变，眼看灾难深重的祖国，炮火连天，民不聊生；拥兵百万的国民党，贪污腐败，节节败退。内心愤慨，无可言状。虽经师友介绍担任了上述名片的那个职务，但是刚在南京报到后，就随机关撤退到了汉口。

当时的武汉，已成为后方的政治中心。平、津、京、沪各地的青年学生，纷纷流亡到这里，国民党却不闻不问。学生们群情激昂，报国无门。面对现实，我既痛心，又焦虑。好些朋友如李公朴、赵师梅、孙耀华等，都同我议论着如何准备打游击。可又

不知道该怎么进行。一个偶然机会，中国银行管理处的农贷稽核张心一和我们谈起，怎样能在湖北招训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，以便往后发放农贷，发动农民群众打游击。我还听说，苏北、皖北的进步青年，有的已利用这种在农村放款的机会，组织农民，训练农民，成为抗日的游击力量。这使我联想起是否我们也可以在湖北招收流亡学生，进行游击训练呢？于是，我先去会见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^①，那时他正要找我担任湖北省棉业改良场场长。见面后，他完全支持我的设想，同意用湖北省建设厅的合法名义，出来筹办。我还提出要用棉业改良场的部分经费进行活动。然后我同孙耀华去应城的汤池找李范一^②，因为他在汤池办了个农村实验区，有现成的房屋设备，可以用来办训练班。我们找到他，他表示赞成，并自告奋勇，愿意参加。接着我又去找民族资本家周苍柏^③，周政治上倾向进步，他慷慨答应在训练费用上，大力支持。万事齐备，只欠东风了。

我有个本家妹妹叫杨刚，是地下党员，后来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。我从1928年以来就同她有来往，在政治上受她的影响很大。但那时我只知道她思想很进步，有独到的见解，令人信服。她曾多次和我谈到：抗日救国，唯有依靠共产党；国民党口是心非，不可指望。她不但给我讲过共产党在“七七”事变后的第二天就发出号召全面抗战的通电，还给我介绍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“东风”，非八路军莫属。我又去征求大家的意见，他们一致赞同，这才鼓起勇气，直接求见董老。

石瑛、李范一都是董老青年时代的朋友。所以，随即由石瑛出面，在他家里请客。席间，董老听了我们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之

① 石瑛：时为湖北省建设厅厅长。

② 李范一：时为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。

③ 周苍柏：时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湖北省银行总经理。

后，恳切地表示：日本貌似强大，但底子很薄，只要我们坚持到底，抗战终将获胜。而要赢得胜利，不能单靠军队，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，实行全民抗战。战争越持久，人民的威力越将显示出来。因此，举办训练班，培养有觉悟、有才干的青年，并通过他们宣传组织群众，是关系抗战胜负的一件大事，不可等闲视之。

二

那次聚会后的一个下午，董老突然亲自到我的办公室（汉口江汉路原上海银行楼上）。随同前来的还有一位英俊而又消瘦的青年。董老郑重地向我介绍：“我们决定派陶铸先生到汤池训练班来负责。”事后知道，陶铸同志被国民党囚禁了十年，不久前才出狱。

当天，我就陪陶铸会晤了石瑛和周苍柏。次日，又一同坐船到汤池见了李范一。就在李范一的家里，商定了训练班的名称、组织、经费以及招生对象、生活安排等问题，并正式成立了训练委员会。主要成员为：主任李范一，教务主任陶铸，总务主任许子威，我负责筹集经费，并和孙耀华一同在武汉主办招生工作。

那段时间，我的社会职业是湖北省棉业改良场场长，而改良场场址远在随县，我只能偶尔去照看一下，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放在汤池训练班。我不断地往返于武汉和应城之间，处理一切对外事务，因而经常要向董老请示汇报，也就有机会和他谈时局、谈政治，并反映自己的思想认识。我那时的想法，主要是觉得自己是搞科学的，改良农业，造福农民，才是本分。至于革命的事，应该让政治家或懂军事的人去做；就我来说，那不过是一种副业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上海、南京的很快沦陷，国民党的昏聩无能，不能不令人悲观失望；共产党虽然大义凛然，毕竟力量过于单薄，又不免使人忧心忡忡。

这些思想问题，我都断断续续地向董老反映了。有一天，他老人家严肃而又恳切地和我作了一次长谈，至今我仍记忆犹新。董老主要是说：“你的父母祖辈，都是历尽千辛万苦的贫苦农民，现在的农民还像他们一样在受苦受难。以你的家庭出身，能够成为一个‘士大夫’真不容易；不过更不容易的是，以你今天的条件，还没有忘记受压迫、受剥削的劳苦农民大众。你不但没有养尊处优，而且还愿意下乡，未失农家子弟的本色。”讲到这里，他停了一停，看了我一眼，又接着含笑地说下去：“不过，你那种农业救国的观点，或者说，要从改进农业技术上去改善农民生活的想法，却是书生之见。因为单凭科学技术，是不可能发展农业生产，提高农民生活的。国民党的那些官僚买办，怎么会让你放手去干呢？就算你能够育出些棉花良种，改进一些栽培方法，使棉花产量有所增加，棉花品质有所提高，结果，真正能得到好处的，也还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、资本家，农民是沾不到什么光的。这些实际问题，你都想过么？”

在反动统治下从事农业工作的重重困难，特别是棉农所受的压级压价、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，我不但曾经亲历，甚至还直接受过许多打击。过去我总是想不通，或者知难而退，不敢追究。如今经过董老这么一指点，才开始接触到问题的实质。

董老看我听得很认真，又继续往下讲：“我知道你上过教会学校，信过基督教，曾经以为宗教可以救国，后来你觉悟了。但是，对于今天的形势，你还没有认识清楚。现在的农村，国民党到处抓壮丁，弄得鸡犬不宁，连田地也没人敢种了，难道还能够实现你那农业救国、科学救国的理想吗？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，按我国的实际来看，首先要打倒土豪劣绅、买办军阀，彻底铲除剥削制度，解放农民。农民获得了解放，才会去学文化、学科学，也才能把生产发展起来，使生活得到改善。”我一边听，一边点头称是。

这时，董老站起来，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目前国难当头，抗战第一，要全民总动员，把敌人赶出去。所以办好汤池训练班，非常重要。你有学识、有抱负，决不愿和国民党同流合污。我们欢迎你这样的朋友。”

这次谈话不久，也就是1938年1月的一天，我和陶铸同志从汤池去汉口。起初，他说董老要介绍一位领导人和我见面。到了汉口，他就带我上旧日租界大石洋行——中共中央长江局，这才告诉我那位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副主席^①。

周副主席完全是政治家的风度，让人一见如故。他首先问我个人的情况，接着要我谈谈美共和苏联农业的情况，当他听我说到美共的同志曾帮助我学习《资本论》时，惊讶地笑了。后来他要我谈谈我个人对时局的看法，一直谈到深夜12点，我才告辞。他约我第二天再谈。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就去了。这次主要是周副主席讲话，话题是敌我双方的战局，他从中日两国的历史，引申到当时的形势，重点是论述关于抗战的持久性。他说得深刻而又生动。大意是日本帝国主义既不能一下子把我们逼上昆仑山，我们也不可能很快就把他们赶下太平洋，一时一地的得失，乃兵家之常事，最后的胜利，取决于以我地大人众之优势，压倒对方妄图速胜的弱点。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，在此一举。因此必须团结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，包括科学家、民族资本家和各方面的开明人士，共同奋斗。他鼓励我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。谈话一直持续到10点多钟，我感到耽误他的时间太多，便坚决要走。临别，他说汤池训练班的工作很重要，很有意义，要把它办好。不过这是归董先生主管的，也就不便提什么意见。

董老和周副主席的教导，言近旨远，语重心长，尤其是那种同志般的态度和殷切的期望，使我深受感动。至于他们渊博的学

^① 周恩来同志时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。

识，深远的意境，更加令人折服。当时我和陶铸同志共事，起初我只知道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、军事家，不料他的组织才能、知识经验，乃至写文章、作演说，无不出类拔萃。过去，我也曾与国民党的中层人士有所接触，相比之下，共产党拥有的非凡人才，远非国民党所能及。依靠共产党的领导，中华民族必能振兴。

三

汤池在湖北应城县，本是偏僻荒村。20世纪30年代，有些知名人士，先后在全国各地选择据点，创建实验区，希望从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入手，进而挽救中国于危亡。如陶行知在南京晓庄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，高践四在无锡社桥等等。应城的汤池原也属于这一类实验区，由李范一先生主办，但是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，抗战便爆发了。所以，他很乐意将场地让出来建立汤池训练班。

汤池训练班是个很独特的组织。一方面它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，建校方针、教学内容、骨干配备，全归董老和陶铸同志亲自擘划掌握。训练的对象，基本上都是平津沪汉各地大专和中学的进步青年与共产党员。训练的目的就是培养干部，在敌后动员群众，打游击，抗日军；可是另一方面，它又是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主办的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，学员结业之后，由国民党湖北省合作委员会分配到各县去发放农业贷款，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。这个训练班的经费，包括全部师生员工的伙食、零用以及行政事务开支，主要由周苍柏先生捐助，少数则从棉业改良场的经费中“挪用”，此外还有个别的捐款。如石瑛曾向我表示，他愿私人提供5000元，不过后来我们没有要。

这个新型的、抗大式的汤池训练班，在烽火连天的1937年年底正式开学了。教师阵容整齐、坚强，主要有：曾志、雍文

涛、刘季平、黄松林、蔡承祖、李华、吴声恺、童世光等同志。课程以政治和军事为主，室内讲授和野外演习、农村调查相结合。当然，也还学一点农村合作贷款的业务知识。课外还到农家去参加劳动，教唱救亡歌曲，演出街头剧。一派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的新气象。这在封建落后的旧中国的农村，是从未有过的，很快就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，但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和恐惧。记得有个姓张的女同志，她父亲是长沙的资本家，忽然寄来一封信，里面画了一把大刀，意思是不立即回去，就要和她一刀两断。可她还是坚持下来了。

由于形势发展太快，要求前来学习的青年过多，因此每期只办1个月左右，即行毕业分配。大多由湖北省建设厅分配到鄂中、鄂西北一带，担任合作指导员，通过举办农贷，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，进而开展游击斗争，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后来有许多学员成为新四军，主要是五师的骨干力量；也有前往延安、华北等地，参加战斗的；或者转往西南、西北，继续学习。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“汤池人”里面，就有顾大椿、潘琪、王全国、刘慈凯、李寿慈、胡畏、吴显忠、孙慰祖等同志。

汤池的影响很大。才办了3期，就受到特务的干扰破坏。接着，国民党顽固派也公开施加压力。大家都很愤慨，又怕发生意外，怎么办？董老和陶铸同志征求我的意见。我说，随着战争的转移，应城已不是久留之地，不如干脆换远一点，到鄂北的襄阳去，那里有个直属我们棉业改良的植棉指导区，住的用的都不缺，只要把训练班的名称，改成鄂北棉业讲习所就行了，经费开支可以用棉业改良场的钱。他们表示同意。于是我又去找石瑛，在谈到经费问题时，石瑛说，只要改良场的预算够用，他支持。这样，汤池训练班又在一个新的名称下继续办下去了。

这时，陶铸同志另有任务。根据董老的指示，由我担任这个“讲习所”的所长，长征干部左觉农（即夏中吾）同志为教务主

任。可是刚办了1期，训练了大约100人，特务又来破坏。加之当时武汉和鄂中一带，相继失守，日军沿江西上，形势紧急，只得停办。学生大多由左觉农和中共湖北地下省委书记钱瑛同志，分别带到敌后去工作。现任广东省副书记的王全国同志就是讲习所的学员。

四

1939年1月，我匆匆赶到重庆。先向董老作了汇报，接着又见了周副主席。当时情况是这样：武汉失守之后，国民党派了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，管辖豫鄂皖一带防区，司令部设在樊城。他到任后，采纳了钱俊瑞同志的意见，成立了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。这个机构较大，范文澜、嵇文甫、李范一、李相符等同志以及许多地下党员，包括部分汤池的学生，都参加了进去。李范一担任了抗委会的政治指导部主任兼该会经济委员会主任，我为经委副主任。襄樊已是国民党后方最大的一个产棉区。当年棉花丰收，我建议应立即设法抢收抢购，以免资敌。李宗仁很重视，马上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经济部，经济部要农本局福生总庄派人到湖北去赶办这件事。农本局就想让我来担任福生总庄樊城分庄的主任。这工作纯粹是做买卖，与自己的科学抱负相差太远。我应该怎么办？

第二天，董老就找我谈话，他说经过研究，认为我还是应该留在鄂北。因为这里既是个政治据点，又是个经济据点，可以筹集经费，支援那一带的敌后活动。而且，陶铸、张执一 etc 同志，还有许多汤池学生都在那里，决不是孤军作战，何况李宗仁的态度在国民党上层军人中是比较好的。“李宗仁很器重你，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。不过，你还要和他的部下搞好关系，这既是革命的需要，也是革命斗争的策略。”

我服从了这个决定。这时，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又任我为

湖北省推广专员，给了我1万元经费，又找中国农民银行给我拨了5万元贷款。带着这一系列的新任务，我重返宜昌。随即会同钱瑛、雍文涛等同志，前往樊城。不料豫鄂抗委会已被撤销，我正好吸收该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，开办福生总庄樊城分庄，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，录用革命青年，并以一个名额的薪津，分给几个人做生活费的办法，容纳了较多的人员进行革命活动。我还利用上面所提到的经费和贷款，在鄂西北特区党委的领导下，以谷城县茨河镇为中心，建立起鄂北手纺织训练所，并附设了纺纱厂、织布厂、木工厂、铁工厂等，所以群众统称为茨河工厂。组织上要我担任训练所所长兼厂长，吴显忠为教务主任，奚望高为生活组长，主要负责人是李范一。所内成立了由特区党委书记王翰、张执一直接领导的党支部，支部书记先后有王曦、刘煌、李萍、王守如、吴显忠等同志。

福生樊庄在当时当地是个相当大的官商机构，颇有名气。一些地下党员的来往活动，甚至伤病员的转移，只要拿一张福生樊庄或者茨河工厂的证明，就能掩护过去。遇到特殊情况，由我个人出面，更能起些作用。有一次，陶铸同志从敌人那里逃脱出来，到茨河找我，我立刻陪他一起到襄阳，把他送进美国人办的同济医院，和已先期到达的张执一同志，住在一间头等病房里，安然避过了特务的注意。那时候，我和革命的同志们亲密无间地在一起，同呼吸，共命运。尤其是汤池的学生，他们来了，我招待食宿，病了由我送进医院，他们都亲切地叫我“妈妈”。当然，斗争是激烈的、残酷的，不免有人牺牲。每当丧失一个战友，特别是汤池的人，我总要痛哭一场。

按照董老的指示，我还负有筹集经费的任务。虽然基本上都尽量设法完成了，但经常要担当风险，甚至要克服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。我没有经验，有时还有些胆小。有一次郑绍文和雍文涛同志一道来找我，说李先念同志领导的鄂中游击队急需一笔款

子，我有些犹豫，郑绍文同志看出来了，拍着胸脯说：“万一出了事，你坐牢，我们来劫狱！”解放后，郑绍文同志和我重提旧事时，还笑着说：“你给的那笔钱，真是一本万利呵！”那段期间，我不但从血的斗争中，明白了许多革命的道理；而且通过接近的同志，受到了活生生的教育。我常常说，从汤池到茨河的那两年，是我生命史上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可是，与此同时，我还得和国民党的官僚政客混在一起，应付他们的吃喝玩乐，他们的无聊又无耻，令人难以忍受。离开重庆前，董老要我和李宗仁的部下搞好关系，我虚与委蛇，但随着事态发展，越来越危险。他们一方面以巨额的利润透迫我，要我拿买棉花的现金跟他们去干走私的勾当；另一方面以威胁的手段，逼着要我加入三青团。我一再想办法回避、拖延，以至拒绝。最后，关系濒于破裂。这时，有人偷偷地告诉我，国民党要把我驱逐出境。我将信将疑地到司令长官部去见李宗仁，不料他拒不接见，随后福生总庄派人来接管了我的工作，我感到事情果真不妙，立即买了一匹马，连夜跑掉了。

五

1939年6月，我又来到重庆。一到就上曾家岸去看董老。董老对我的情况早有所闻，不待我汇报，就对我说：“你在鄂西北的工作，很有成绩，不要灰心。”接着表示：“先安心休息一下。在你没有找到职业以前，住处和生活，都由我们负责解决。”董老的安慰和关切，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。因为我很明白，当时党的经费极其困难，哪怕在董老那里吃顿饭，我都有些不安，怎么还能让党来接济我呢？

由于我是被戴了“红帽子”离开湖北的，因此，在国民党的那些机关里，都挂了号，都不肯用我了。反复托人，一再碰壁。可是，这种能够理解的歧视和打击，不但没有使我动摇，反

而坚定了自己对党和革命的信心与决心。我觉得继续呆在重庆，毫无意义，而圣地延安，却越发激起了我内心的向往。于是，我正式向董老提出了这个请求：第一，我到延安去，可以加强对自己的锻炼和改造；第二，我的科学知识，可以对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有所贡献。

董老听我的陈述，只是含笑地点头。听完之后，首先他分析了当时在白区工作的重要意义，指出国民党正在进行反共降日的阴谋活动，破坏统一战线，所以在重庆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做。然后，他说我在国民党的政界、工商界以及银行、纱厂等方面，都有人缘，而且又是美国博士，这是不可多得的条件。留在白区，比到延安将更有作用。他还具体地教导我：干革命，最要紧的是服从革命的需要。他对我从汤池以来的表现，说了几句赞赏的话之后，就着重地提醒我：以后在工作中，不要那么抛头露面了，要更好地学会和反动派打交道的斗争艺术。这以后，董老一方面指导我系统地进行学习，经常让我读一些材料，如毛泽东主席的《论持久战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》以及内部文件；另一方面要我少在公开场合出面。有一次，王寅生同志征集我在报刊上要发表的声明中签名，我去请示董老时，他摇摇头，认为我不必那样做。

政治形势的变化很复杂。我往往对客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，分不清楚。有一次，我在向董老谈自己的学习和感想时，他老人家以严肃而沉重的语调对我讲：“虽然国共两党还是在合作抗日，但是，随时要警惕任何突然事件的发生。”我表示有点不解。他把手一挥：“如果他们要动手，我们就还击！”

9月，国民党四川省农业改进所通过美国同学胡竟良的关系，找我去当技正兼农业经济组主任，地点是成都。去不去呢？我问董老，董老说：“好，那里离重庆也不远，是个重要的地方。”临走，董老介绍我和成都地下党的李相符同志认识，以便